

# 创业能带动就业发展吗?

——一个文献综述的视角

张成刚<sup>1</sup>, 廖毅<sup>2</sup>

-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劳动经济学院, 北京 100070;  
2.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就业研究所, 北京 100872)

**摘要:**“以创业带动就业”是中国积极就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新创企业的出现将改变过去以现存企业作为吸纳就业主体的格局。但新创企业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带动”关系。已有的研究证明创业对就业的影响存在岗位创造效应、挤出效应与供给方效应。更多新创企业可能增加就业总量,也可能降低就业总量。新企业建立后,新企业之间、新企业与现有企业之间激烈地互动与竞争,更强大、更具创新性的企业存活下来,此时就业总量才会更快地增长。文章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综述了新创企业带动就业的研究,并根据已有针对发达国家和中国的研究,对创业带动就业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创业;企业家精神;新创企业;就业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7)04-0076-09

**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17.04.009

张成刚,廖毅. 创业能带动就业发展吗? ——一个文献综述的视角[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17(4):76-84.

## Review on the Effects of New Firm Formation on Employment

ZHANG Cheng-gang<sup>1</sup>, LIAO Yi<sup>2</sup>

- (1. School of Labor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2. China Institute of Employment Research,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Innovation and start-up has become the impulse of transition and upgrade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emergence of many start-ups will change the situation and the existing enterprises create new employment. In this way, the relation between start-ups and job creation could affect employment in the long run when industrial structures are adjusted. Empirical researches have proven that the effects of new firm formation on employment last for a long time. Serious competition has e-

**收稿日期:**2017-02-21

**基金项目:**全国社科青年项目“新就业形态对去产能职工就业帮扶机制与政策评估研究”(17CJY069)

**作者简介:**张成刚,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劳动力市场政策评估、就业与创业研究;廖毅,女,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就业与创业、薪酬研究。

merged between new firms and between new firms and old firms. Only highly innovative firms survive. The employment rate increases. This study reviews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es on new firm formation and employment from home and abroad. And this study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policy-making on the issue of new-firm formation accelerating employment increase.

**Key words:** start-up; entrepreneurship; new firms; employment

## 一、引言

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系列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全社会的创业热潮。2015年,国内新增创业人员约2400万<sup>①</sup>,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2万户<sup>②</sup>。随着经济增速趋缓,依靠创业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创造就业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系列政策出台的目标之一,是希望通过创业激发增长动力,帮助解决由于实体经济发展困境而导致的就业困境<sup>③</sup>。我国“十三五”促进就业规划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创业环境显著改善,带动就业能力持续增强”的重要目标。

但是政策部门与学术界对于创业和就业的关系,仍然存在着误解。一种观点从直觉的认识出发,认为创业自然可以带动就业,更多新创企业可以带动更多就业是顺理成章的。这种观点忽视了企业之间的互动和影响。已有的研究证明这种直觉的认识并不可靠。另一种观点认为拥有新技术的新建企业大范围替代现存企业,会导致就业量急剧下降。例如有学者担心电子商务的发展冲击了实体零售业,长期内会导致就业大幅萎缩。这种观点注意到了新建企业对现存企业的挤出效应,但忽视了创新的企业在长期内会推动相关企业竞争能力提升,从而带动就业增长。这也是本文要论述的观点之一。已有的研究表明,创业对就业的影响并非都是正向的。更多新创企业可能增加就业总量,也可能降低就业总量,取决于市场结构、企业创新程度和经济社会背景等诸多外在环境因素。

了解现有研究中创业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和实证研究结果,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制定创业支持政策,提高创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本文综述了新建企业与就业关系的重点研究文献,总结了创业带动就业的机制,梳理了已有实证研究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环境的实证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 二、新企业创建与就业关系的理论基础

传统研究认为,新企业成功进入市场并实现增长时就会直接创造新的就业。这种观点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被纠正。学者发现新企业的净工作创造可能并不为正。首先,大多数企业创办伊始规模都较小。在这些新创办企业中仅一小部分产生了实质数量的工作<sup>[1]</sup>。新企业所贡献的工作仅仅是经济中工作存量的一小部分<sup>[2]</sup>。Storey<sup>[3]</sup>发现1989年英国的工作存量仅有5.5%来自于那些两年内创建的公司。其次,与市场现存企业相比,新企业失败的可能性更大。许多新企业在开办一段时间后都被迫离开市场,因而它们对工作供给的贡献是暂时的。新企业的存活率非常低,成功的新企业要达到现存企业的平均规模也需要多于10年的时间<sup>[4]</sup>。第三,成功的新企业可能对现存企业存在挤出效应(也称为市场选择效应),即新企业挤占现存企业市场份额或迫使现存企业完全退出市场,进而导致工作存量的降

①曾红颖:《结构调整带来新变化创业带动就业大有可为》,载《中国经济导报》2016年1月2日第2版。

②国家工商总局2015年度全国市场主体发展数据。

③李克强:《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拓展就业空间》,2015年5月19日,全国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重要批示。

低。如果新企业进入使现存企业退出市场,或者新企业是由于现存企业将特定的业务或工作分配给新企业而产生的<sup>[5]</sup>,那么新企业的工作供给就相对有限。

以上所论述的几个方面,无论是新企业直接创造岗位还是挤出现存企业的岗位,都是新企业创建对就业的直接效应<sup>[6]</sup>。已有的研究也开始考虑新企业创建可能产生的间接效应——供给方效应(也称为溢出效应)。供给方效应来源于新企业创建后对整个市场产生影响,这样的影响表现在:第一,新企业进入市场后会提高市场整体效率。新企业进入增强了竞争,为现存企业带来了改进效率的强烈动机。不仅实际的新进入者,包括那些潜在的新进入者,都能促使现存企业的经营更具效率。新企业对现存公司构成了真正的或想象中的竞争威胁,增加了区域性竞争,进而鼓励现存公司改进自身绩效,创造新的工作岗位<sup>[7]</sup>。第二,新企业进入后会加速市场结构改变。结构的改变可以通过不同经济单位的转换完成,比如新企业进入及现存企业退出。这种情况下,现存企业并不必然经历内部的变化,而是被新进入者取代了。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毁灭”概念和马歇尔的比喻——“森林里老树木为了让位给新树木而必须倒下”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此外,新企业进入带来的高人员流动率加速了新技术采用和产业的组织创新,从而帮助提高了整个市场的生产力。第三,新企业进入可以帮助扩张创新。新企业更有可能引入影响整个经济的重大创新,更有可能创造新的市场<sup>[8]</sup>。在引进创新过程中,新企业之所以能充当这一显著角色,可能是因为相比寻找创新机会,现有的厂商对提升已有产品的利润更感兴趣<sup>[4]</sup>。另一方面,创建新企业似乎是知识商业化唯一可能的机会,或者说是最有希望的机会<sup>[9]</sup>。Audretsch 和 Thurik<sup>[10]</sup>认为,随着规模经济重要性的减弱、世界经济不确定程度的增加,新企业在技术发展中的角色得到加强,进而为创新的引进创造更大的空间。第四,新企业进入带来了革新。新企业可能会带来更多类型的产品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新进入企业的产品、项目不同于现存企业,或引进了流程创新,那么新企业将带来更丰富的产品系和更新的解决方案。新企业引进重要产品或流程创新,意味着可能出现更能匹配消费者偏好的产品,进而增加了社会整体福利。从长远看,新企业带来的产品种类和问题解决办法可能会强化劳动力分工,刺激创新,进而对整个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sup>[8]</sup>。

综合上述对创业与就业关系的讨论可以看出,新企业数量增加与就业总量增加并非一般直觉认识中的“带动”关系。Fritsch 和 Mueller<sup>[8]</sup>概括了新企业创建可能对就业变动带来的影响。根据 Fritsch 和 Mueller<sup>[8]</sup>以及其他研究,本文总结了新企业创建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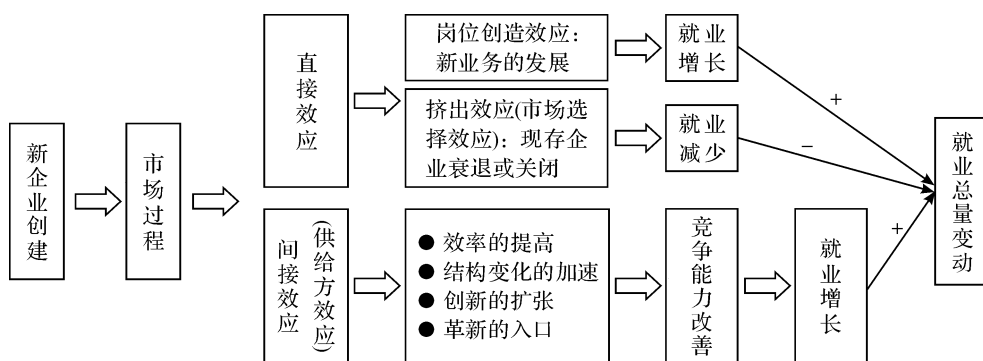


图1 新企业创建带动就业的作用机制

新企业创建的直接效应包括岗位创造效应和挤出效应。岗位创造效应概括了对“创业带动就业”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即新企业建立后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从而带动了就业的增长。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意味着新进企业与现存企业存在替代与挤出。现存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有可能被迫减少雇佣,从而导致岗位减少,这就是新企业创业对就业的挤出效应。新企业对就业的供给方效应,来自于新企业建

立后促使一个国家、区域或产业的竞争力显著改进,从而刺激劳动力市场整体就业的增长。总结来看,新企业创建对就业增长供应方效应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起作用。其一,新企业为经济提供了一个引入新观念 and 创新的媒介,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来源<sup>[11]</sup>。Baptista 等<sup>[12]</sup>指出,如果仅仅是增加了竞争,或者是在总体市场容量不变的情况下“适者生存”,那么新企业对就业的净效应将不可能显著为正。因此,新企业供应方效应的大小依赖于新企业在创新和效率方面的特质。即使如此,新企业中的创新并不如期望中的那么频繁。创新在新企业中仅仅是特例,而不是惯例。例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实施的小企业调查表明,企业创办的最初一年内,为市场带来新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比例仅为4%~17%<sup>[13]</sup>。

其二,新企业在就业方面积极的净效应依赖于新企业带来的市场增长。除了由现存企业兼并的新企业,退出的新企业对现存企业的积极影响可能仅仅来自持续增长的竞争压力,而不是来自创新这一特性<sup>[8]</sup>。供给方效应产生过程的一个特征是,新企业创办所带来的积极供给方效应并不要求新企业是成功的。只要新企业为现存企业带来了改进,产生了溢出效应,增加了整个市场容量,那么即使新企业失败了,或者在进入不久就退出了市场,它也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但新企业失败的高机率能劝阻潜在的新进入者,从而降低正向的溢出的潜力<sup>[8]</sup>。同时,新企业自身也具有激励作用,t时期创办的新企业可能会刺激t+1时期新企业的建立。这可能是由于t时期的新企业形成了t+1时期企业的市场。另外一种可能是,t时期新企业的成功激励其他人的模仿行为,即t时期的企业成为了“榜样”。同样,t+1时期的企业将激励以后更多企业的创办,进而创造更多的工作<sup>[14]</sup>。

Feldman<sup>[15]</sup>和Baptista<sup>[16]</sup>等作者认为,由于聚集经济的外部性增加了企业汇集新观念的能力,因此与创新有关的溢出效应在周围受限制的地理区域内更为显著。Glaeser<sup>[17]</sup>找到了这些企业增长和创新活动溢出效应的证据。Fritsch和Mueller<sup>[18]</sup>认为在创业和工作创造关系的研究中,区域是更好的分析单位,因为它们解释了区域内各地区之间经济的相互影响。Van和Storey<sup>[14]</sup>认为,新企业之所以对区域就业产生影响,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新企业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区域内和区域外的投入。基于这些争论,研究者们提出新企业产生的任何积极的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其进入的区域内,因此,新企业产生的区域就业影响是值得评估的。

### 三、新企业创建对工作创造影响的实证研究

早期的研究认为新企业创建对就业总量具有正向的带动作用。《全球创业观察》<sup>[19]</sup>分析了21个国家的总体创业活动和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发现创业和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强相关关系。在具有相同经济结构的国家中,创业和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超过了0.7。Johnson和Parker<sup>[20]</sup>发现企业诞生率上升和企业死亡率下降使失业显著减少。Ashcroft和Love<sup>[21]</sup>通过考察英国1981—1989时期新建企业与就业的变动,发现新企业创建和净就业变化显著正相关。上述研究,虽然使用了不同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但都得到了创业支持工作创造上升的证据。此外,Reynold<sup>[22-23]</sup>,Acs和Armington(2004)<sup>[24]</sup>都发现了新企业创办对就业具有确定的积极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的程度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所不同。Foelster<sup>[25]</sup>发现,瑞典的自我雇用率的增加对区域就业有正影响。

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得到了模棱两可的结论。Fritsch<sup>[26]</sup>在其开创性的研究中分析了(前)西德74个计划区域1986—1989年的数据,发现从长期看,德国的制造业中,企业进入率和就业变化之间存在正向统计关系,但是与服务业和整个经济却是负相关关系。Audretsch和Fritsch<sup>[27]</sup>对西德进行了新的考察分析,得到三个结论。第一,证实了Fritsch<sup>[26]</sup>的结论,即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创办率与就业变化不相关;第二,在20世纪90年代,具有较高企业创办率的区域经历了较高的就业增长;第三,20世纪80年代具有高企业创办率的区域,在20世纪90年代显现出高就业增长。作者从最后一个重要的结论中获得启发,进而提出新企业创建对就业增长影响不清晰的原因在于这种影响显性化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



滞后。

近期的研究更清楚地表明,新企业的创办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分布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sup>[8,14,18,27]</sup>。另外,这些研究揭示了地区之间这种影响的程度差异。Van 和 Storey<sup>[14]</sup>在对英国区域新企业创建对就业影响的研究中调查了时间滞后的相关性,发现区域就业增长率确实是由几年前市场新进入者塑造的。这种影响的程度随时间推移呈倒 U 型分布。创业活动对5年后的就业增长影响达到峰值,10年之后显著影响消失。Fritsch 和 Mueller<sup>[8]</sup>发现新企业创办的净就业影响在创办当年是非常小的,在创办之后的6年影响为负,随后呈现正的净就业影响,并约在创办8年时达到峰值,从第10年起,影响开始消退。Fritsch 和 Mueller<sup>[8]</sup>认为,企业创办对就业的负影响主要来自新企业失败和现有企业挤出效应造成的市场选择结果,直到当供应方影响占主导地位时,才显现出正影响。Fritsch 和 Mueller<sup>[18]</sup>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新企业形成对区域发展影响的不同阶段在具有高劳动力生产率水平的地区相对显著。在低生产率地区,新企业创办活动的总体就业影响可能是负。Van 和 Suddle<sup>[28]</sup>运用1988年至2002年的区域数据库,分析了荷兰新企业创建和区域就业变化的关系,发现新企业对于地区发展的最大影响在6年后达到最大。文章结果还表明,在荷兰,新企业创建的总体就业影响是正的,但是新企业的直接就业影响可能很小。更进一步,文章发现新企业的就业影响在制造业最大,而新企业在都市化较高的地区就业影响较高。Baptista 等<sup>[29]</sup>使用葡萄牙1982—2002年数据库,发现无论是源于更强的竞争、更高的效率还是更多的创新,新企业创办的供给方效应至少与直接影响一样重要。然而,供给方效应在新企业创建的8年左右发生,这使得滞后效应的形状类似于 U 型。这个结论表明,新进入者增强了整个地区的竞争,但这种改善仅仅在一段时间后变得显著。Baptista<sup>[12]</sup>深化了其2005年的研究,发现新企业诞生的间接影响对随后的就业增长要强于直接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使用相同方法的其他国家的结论不同,在葡萄牙的例子中,积极的间接影响并不会逐渐消失。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在葡萄牙的通常模式中,新企业就业影响的时间滞后会更长一些。

新创企业的数量与质量对于就业影响的大小同样也是实证研究讨论的问题之一。一些研究认为,创业所带动的就业主要来源于少数高质量的企业(一般定义为高成长性的新创企业)<sup>[30]</sup>,因此支持增加新创企业数量的公共政策可能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新创企业数量的增加意味着竞争加剧,反而有可能破坏新创企业的质量。“数量”与“质量”之争的结果对于创业支持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Shane<sup>[31]</sup>认为对于刺激创业的政策来说,创业企业带动的就业增加并不是依靠创业企业的数量,而是依靠高质量、高成长性的公司。政策制定者应该停止补贴一般的创业企业转而聚集于有高成长潜力的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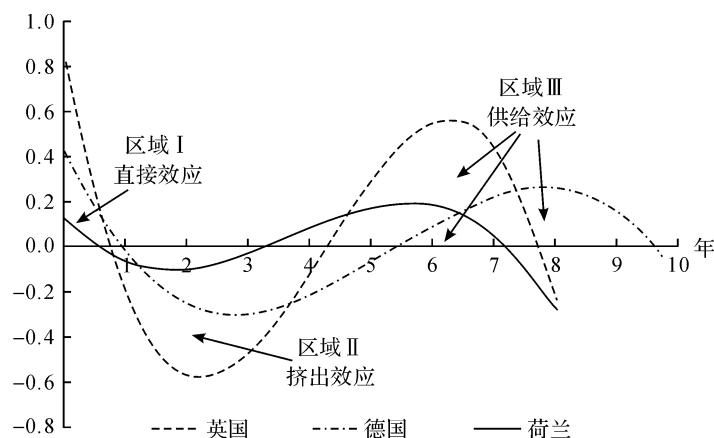


图2 创业带动就业的模式

通过上述主要 OECD 国家的研究,发现创业带动就业的模式在各个国家体现了相似性(见图2)。在创业初期的1~2年里,新建企业直接的岗位创造效应为正,但岗位创造效应非常小。之后由于竞争加剧,新建企业开始对整个市场产生负向的挤出效应,效率低下的企业被挤出市场,就业总量下降。负向的挤出效应持续5~8年之后,由于新企业进入对市场环境的影响,使所有企业(包括现存企业)的竞争能力增强,导致了正向的供给方效应。

对中国市场环境中“创业带动就业”的实证研究目前还非常缺乏。已有的部分研究证明中国市场环境中创业对就业有正向的带动作用。董志强等<sup>[32]</sup>运用广东省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创业活动对失业率的影响,证明自雇创业率可以有效降低失业率。董志强等的研究也发现自雇创业率对降低失业率有滞后的影响。创业对失业率的影响有正向的,也有负向的,但总体上降低了失业率。卢亮、邓汉慧<sup>[33]</sup>的研究证明了创业对就业存在正向作用,并且在企业建立后的不同时期,对就业的影响有差异。他们的研究将创业对就业的影响分为创业初期、创业中期和创业末期。其中,创业初期和创业末期可以带动就业,而在创业中期,创业会摧毁就业岗位。张成刚等<sup>[34]</sup>的研究发现中国市场环境中创业对就业的带动与 OECD 国家有相似的模式。新企业创立后的短期(1~2年)、中期(3~8年)和长期(8~10年)三个阶段。短期内,新建企业对就业的岗位创造效应为正。中期内,新建企业产生的挤出效应为负。但是到新企业建立10年左右,新企业对就业的正向供给方效应就体现出来。但也有少数研究认为中国市场环境中创业对带动就业的作用不大。付宏<sup>[35]</sup>的结论与上述两个研究相反,认为创业与就业的“难民效应”明显,而“企业家效应”不明显,即创业降低失业的效果并不明显。

## 四、新企业创建与就业创造关系的总结与评述

### (一) 新企业创建与就业创造的共识与分歧

本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综述了有关创业带动就业的研究。理论上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主要从直接影响(包括岗位创造效应和挤出效应)和间接的供给方效应等方面进行分析。目前来看,理论层次上有关创业和工作创造关系的探索已经相对比较成熟。对新企业直接的岗位创造、挤出效应,再扩展到间接的供应方溢出效应的探讨,使得创业和工作创造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日渐清晰,这些理论的完善为实证结果的解释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汤灿晴等<sup>[36]</sup>刻画了创业带动就业的微观机制。他们考虑了创新扩散和附加市场成长过程,通过构建扩展的古诺模型为上述创业带动就业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提供了更进一步的解释框架。该研究的模拟结果也符合实证研究发现的一般规律。

实证方面,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了新创企业在创业初期的原始雇用,仅考虑了创业对就业的短期影响,缺乏对新创企业对就业长期影响的评估。近期的研究考虑了新创企业对就业影响的时间滞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新创企业对就业的长期影响比其在创办初期的影响更为重要<sup>[2,8,14,37]</sup>。对主要 OECD 国家(美国、德国、英国、荷兰和葡萄牙等)以及对中国的研究发现了相似的创业影响就业的滞后模式,即创业初期(1~2年),新创企业直接带动了就业,但规模较小;中期阶段(3~5年),由于市场竞争和市场选择,有些企业被挤出市场,就业规模下降;创业后期(6~10年),由于创新带来的供给方效应,所有企业的竞争力得到改善,就业规模重新扩张(见图2)。

尽管新企业带动就业的模式在不同国家基本相似,但影响大小和滞后结构上在国家间,甚至国内不同地区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在控制了地区产业结构差异之后仍然存在。学者对产生这些差异的解释不一。Baptista 和 Preto<sup>[38]</sup>将创业对就业影响大小和滞后结构的差异归纳为两个来源,区域类型和新创企业类型。从区域类型的角度看,一些学者认为集聚的外部性是导致不同区域创业带动就业差异的原因<sup>[39]</sup>。Acs 和 Mueller<sup>[39]</sup>发现美国的大都市区(相当于高聚集区)对新企业带动就业增长最为有利;

尽管在小城镇和小城市新企业注册率较高,但无法支持这些快速成长公司的扩张。区域的集聚和商业活力程度越高,创业对就业的带动作用越强。从新创企业类型的角度看,另一些学者认为,技术更替的速度是导致创业对就业影响差异的原因。Baptista 和 Preto<sup>[38]</sup>对葡萄牙的数据进行研究,证明知识型新创企业对就业的长期影响更显著。这类企业的产品和技术周期更短,因而就业减少(由于挤出效应)和就业创造(由于供给方效应)的规模都会变大,并且这种影响在聚集程度更高的区域更明显。国际劳工组织报告认为<sup>[40]</sup>,制度因素和市场环境也是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如区域内便利的融资、可靠的基础设施和宽松的监管都有利于促进对就业的带动。

## (二) 中国市场环境下的特定问题

总体上说,对中国市场环境的研究证明中国的新建企业总体上可以带动就业。与主要 OECD 国家的研究结论一致,中国市场环境中创业对就业的带动作用也发生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并且创业对就业的影响并非都是正向的,挤出效应的存在减弱了创业对就业的带动作用。考虑到挤出效应,创业对就业的正向带动要等新企业创建很长时间,产生了供给方效应之后才能出现。在中国市场环境中讨论创业对就业的带动,不能忽视长期中的供给方效应。

与 OECD 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比较,中国市场新建企业的挤出效应持续时间更长,供给方效应出现的时间更晚,这样的结果可能与中国市场中新建企业创新水平较低导致企业同质性高,市场竞争激烈有关<sup>[34]</sup>。《全球创业观察2011》认为,中国初创企业的创新度不足。尽管从2006年开始,中国的机会型创业比例上升,并超过了生存型创业比例<sup>[41]</sup>,创业活动指数甚至高于美、英、德、日等发达国家,但中国创业活动中“产品采用新技术”和开发“新市场”的指数远低于这些国家,说明中国创业活动的创新含量仍比较低<sup>[42]</sup>。创新不足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市场中挤出效应持续了更长的时间。

使用新建企业数量<sup>[34]</sup>还是个体户数量<sup>[32,33]</sup>作为创业的代理变量可能会影响实证研究结果。在中国市场环境中,新建企业更偏向于机会型创业,而个体工商户更偏向于生存型创业。《全球创业观察中国报告2007》<sup>[43]</sup>认为机会型创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岗位优于生存型创业。现有实证研究中,使用新建企业作为创业代理变量导致了创业对就业更大的影响,同时挤出效应的负向作用也更明显。这两种创业类型对就业影响的差异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进行探究。另一个对中国环境实证研究的缺陷在于主要使用加总数据,而缺乏使用微观数据进行的研究。数据的缺陷也限制了对中国市场环境中的聚集效应、公司类型和公司质量等变量影响的讨论。这些讨论对于回答中国环境中创业对就业的影响模式与主要 OECD 国家的差异非常重要。已有的文献也无法区分新建企业带来的就业中,有多少来自于少数高成长的企业或数量庞大但成长性未必优良的新企业。

## (三) 结论与启示

早期的创业带动就业研究主要论述了创业岗位的创造效应,但事实上更应该考虑的是创业对就业的长期影响。为了更好地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中创业对就业的带动,在中国积极就业政策的制定实施中,不应只重视短期的岗位创造效应,更要重视新建企业创建后中期的挤出效应和长期的供给方效应。政策制定中应鼓励和引导具备创新能力,能够采用新技术、组织形式、流程模式,提供新的服务、产品以及技术解决办法的企业进入市场,并从创业环境、制度设计等方面对该类有创新能力的新建企业提供支持,从而提升区域相关或产业相关企业整体核心能力。地方政府如果仅依靠大规模投资,设立大型企业,而不注重大企业的创新能力及其对现有市场竞争格局的促进作用,很有可能助长其对中小企业的挤出效应,从而弱化供给方效应,最终导致区域内中长期就业效应减弱。

其次,市场选择对于供给方效应的发挥至关重要。因此,公共政策应当保障市场选择过程。市场新进入者的失败及其退出市场应该被理解为市场选择的必需要素,政策不应过度保护被市场机制淘汰的企业。支持和鼓励新创企业的产生也不应该导致损害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如果出现新建企业仅仅因

为享受政策支持将现存企业挤出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将会损害供给方效应的发挥。在制定促进创业的政策措施时,应该避免类似的扭曲效果。

最后,“创业带动就业”政策实施成功的关键在于市场机制而非创业政策本身。全面深化改革,正成为社会的新常态<sup>[44]</sup>。以激励创业为目的的一系列创业政策,如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金融财税流通改革等可以帮助提升创业率,但如果政策改革不能激励具备创新能力的企业与现有企业展开竞争,或者政策保护本应被市场淘汰的企业,说明市场机制并不完善。新建企业没有与现存企业展开良性互动,彼此激发竞争力,长期的供给方效应就无法实现。因此,着眼于长期,着眼于市场选择与市场机制,鼓励创新与竞争,才是“创业带动就业”政策成功的关键。

#### 参考文献:

- [1] FRITSCH M. Arbeitsplatzentwicklung in Industriebetrieben[M]. Berlin: de Gruyter, 1990:12-16.
- [2] VAN S A, STOREY D. The link between firm births and job creation: is there an upas tree effect? [J]. *Regional studies*, 2004, 38(8): 893-909.
- [3] STOREY D J. Understanding the small business sector[M]. London: Routledge, 1994: 18-26.
- [4] GEROSKI P A. What do we know about entr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995, 13(4):421-440.
- [5] STOREY D J, JOHNSON S. Job generation and labour market change[M]. London: MacMillan, 1987:125-145.
- [6] FRITSCH M. New firms and regional employment change[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1997, 9(5): 437-448.
- [7] DISNEY R, HASKEL J, HEDEN Y. Restructuring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UK manufacturing[J]. *Economic journal*, 2003, 113(489):666-694.
- [8] FRITSCH M, Mueller P. The effect of new business formation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over time [J]. *Regional studies*, 2004, 38(1):961-975.
- [9] AUDRETSCH D B. Innovation and industry evolution[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173-188.
- [10] AUDRETSCH D B, THURIK A R. What is new about the new economy: sources of growth in the managed and entrepreneurial economies[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01, 19(1):795-821.
- [11] ROMER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5):1002-1037.
- [12] BAPTISTA R, VÍTOR E, PAULO M. Entrepreneurship,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job creation: the case of Portugal[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8, 30(1):49-58.
- [13] KEVIN F M, LES W. The west midlands business survey[R]. Birmingham, UK: Price Waterhouse Coopers, 1999:1-12.
- [14] VAN S A, STOREY 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rm births and job creation: did this change in Britain in the 1990s? [C]. Rotterdam: EIM Business and Policy Research, 2002:1-19.
- [15] FELDMAN M P.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4:35-46.
- [16] BAPTISTA R. Clusters, innovation and growth: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M]// SWANN P, PREVEZER M, STOUT D.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mputing and biotechnolog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3-51.
- [17] GLAESER E, KALLAL H, SCHEINKMAN J. Growth in citi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2, 100(6):1126-1152.
- [18] FRITSCH M, MUELLER P. The effects of new business formation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over time: the case of Germany[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8, 30(1):15-29.
- [19] GEM.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00 executive report[R]. Kansas City, MO: Kauffman Center for 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 2000:1-60.
- [20] JOHNSON P, PARKER S. Spatial variations in the determinants and effects of firm births and deaths[J]. *Regional studies*, 1996,30(7):679-688.



- [21] ASHCROFT B, LOVE J. Firm births and employment change in British counties[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1996, 75(4):1-18.
- [22] REYNOLDS P D. Autonomous firm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6-90[J]. *Regional studies*, 1994, 28(4):429-442.
- [23] REYNOLDS P D. Creative destruction: source or symptom of economic growth? [M]// Acs Z, Carlsson B, Karlsson C. *Entrepreneurship,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the macro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97-136.
- [24] ACS Z, ARMINGTON C. Employment growth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n cities[J]. *Discussion paper on entrepreneurship,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2004, 13(4):1-46.
- [25] FOELSTER S. Do entrepreneurs create jobs?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0, 14(2):137-148.
- [26] FRITSCH M. Turbulence and growth in West Germany: a comparison of evidence by regions and industries[J].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996, 11(2):231-251.
- [27] AUDRETSCH D B, FRITSCH M. Growth regimes over time and space[J]. *Regional studies*, 2002, 36(2):113-124.
- [28] VAN S A, SUDDLE K. The impact of new firm formation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Netherland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8, 30(1):31-47.
- [29] BAPTISTA R, ESCÁRIA V, MADRUGA P. Entrepreneurship,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job creation: the case of Portugal[J]. *Small bus econ*, 2008, 30(1):49-58.
- [30] BAUMOL W J, LITAN R E, SCHRAMM C J. Good capitalism, bad capita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rowth and prosperity[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30-76.
- [31] SHANE S A. Why encouraging more people to become entrepreneurs is bad public policy[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9, 33(2):141-149.
- [32] 董志强,魏下海,张天华. 创业与失业:难民效应与企业家效应的实证检验[J]. *经济评论*, 2012(3):80-96.
- [33] 卢亮,邓汉慧. 创业促进就业吗? 来自中国的证据[J]. *经济管理*, 2014, 36(3):11-19.
- [34] 张成刚,廖毅,曾湘泉. 创业带动就业:新建企业的就业效应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15(1):38-47.
- [35] 付宏. 中国的创业活动与就业增长:“难民效应”还是“熊彼特效应”? [C]. 第五届(2010)中国管理学年会——创业与中小企业管理分会论文集, 2010:1-6.
- [36] 汤灿晴 董志强 李永杰. 创业何时带动就业:一个理论考察[J]. *中国劳动经济学*. 2011(1):150-175.
- [37] FRITSCH M. How does new business formation affect regional development?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8, 30(1):1-14.
- [38] BAPTISTA R, PRETO M T. New firm formation and employment growth: regional and business dynamic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1, 36(4):419-442.
- [39] ACS Z J, MUELLER P. Employment effects of business dynamics: mice, gazelles and elephant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8, 30(1):85-100.
- [40] DEIJL C, De K J, VELDHUISVAN E C. Is small still beautiful? literature review of recent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contribution of smes to employment creation[R].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ILO), 2013:1-72.
- [41] 高建,姜彦福. 全球创业观察中国报告(2006)[R]. 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 2006:35-56.
- [42] 高建,任程源. 全球创业观察中国报告(2015)[R]. 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 2016:46-68.
- [43] 高建. 全球创业观察中国报告(2007): 创业转型与就业效应[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37-76.
- [44] 于洪军,刘爱莲. 供求关系视角下马克思就业思想进路及启示[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6):23-28.

